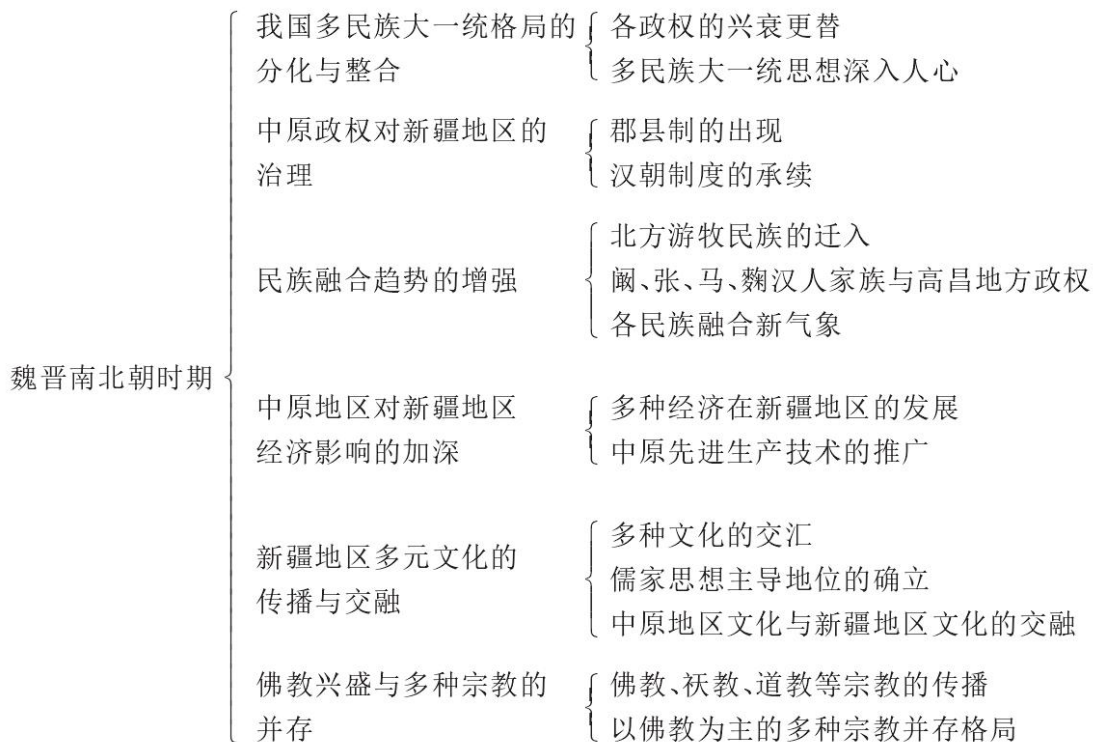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

本章概要

魏晋南北朝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阶段，先后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各政权的对峙。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经过了近 400 年的分化与整合，全国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被打破，各民族加强了接触和交流，经济文化特征趋同倾向明显，为隋朝再次实现统一奠定了基础。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迭频繁，但是中原等地区与新疆地区的密切联系并未中断，中原等政权将郡县制度推行到了新疆地区，始终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受全国性民族大迁徙、大流动的影响，许多北方游牧民族以及更多的中原地区汉族迁入新疆地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交融，特别是中原等地区与新疆地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加速了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为隋唐大一统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章内容结构图：



第一节 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分化与整合

魏晋南北朝包括三国（220—280）、西晋（265—316）、东晋南朝（317—589）与十六国北朝（304—581）三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由割据动荡向整合统一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东汉后期，在外戚宦官的腐朽统治下，农民的境遇每况愈下。自安帝时起，流民暴动就

连年不绝。灵帝时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的统治。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汉灵帝为了强化地方军力，将州部刺史改为州牧，选九卿、尚书等朝廷重臣充任。至此，州从监察机构演变为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一些州牧乘乱发展个人势力，埋下分裂割据的隐患。

一、各政权的兴衰更替

东汉末年，曹操收编了部分黄巾军，势力迅速崛起。196年，曹操把汉献帝从都城洛阳接到许（今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200年，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大败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地区。208年，曹操亲率大军南征，欲统一全国，但在赤壁（今湖北蒲圻（qí）西北）遭到孙权、刘备联军的抵抗，大败而回。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其子曹丕废汉献帝，在洛阳称帝，国号魏，史称曹魏（220—265）。曹魏在三国中最为强大，其直接控制区东起朝鲜半岛北部，西至帕米尔高原，南到秦岭长江一线。曹魏政权建立后，刘备也于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221—263），263年被曹魏政权灭亡。222年，孙权称吴王，国号吴，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史称东吴或孙吴（222—280），280年为西晋所灭。

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265—316）。280年，西晋消灭孙吴政权，统一全国。西晋时期的统治区域，东、南至海，西至帕米尔高原，西南至云南、广西，北至大漠，东北至辽东。但西晋的统一是短暂的，后期出现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316年，西晋灭亡。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纷纷建立割据政权，中原陷入分裂状态，直到北魏统一，长达一百三十四年间，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

“五胡”即五个“骑马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即这些骑马民族与汉族建立的政权：汉（其后是前赵）、后赵、前燕、成汉、前凉、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夏。

匈奴人建立的有汉（前赵）、北凉、夏；鲜卑人建立的有前燕、后燕、南燕、南凉、西秦；羯人建立的有后赵；氐人建立的有前秦、后凉；羌人建立的有后秦；汉人建立的有前凉、西凉、北燕。

五胡十六国，从表象上看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时期，深入探究起来，它其实应该说是由分裂走向再统一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第一次统一是后赵石勒实现的，他统一了除辽西的前燕和凉州的前凉之外的北方地区，是北方短期的小统一。第二次是前秦苻坚统一了整个北方，是北方短期的大统一。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出现了更大的分裂局面。但是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同步进行，终于走向了北魏的第三次统一北方。

淝水之战后，鲜卑族拓跋部首领拓跋珪于386年重建代国，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86—534）。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424—452），先后消灭北燕、北凉，于439年统一北方，统治区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西域，东北至辽西，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534—550）与西魏（535—556），双方隔黄河而治。东魏后为北齐（550—577）所代，西魏为北周（557—581）所代。577年，北周周武帝出兵灭北齐，统一北方。周武帝死后，北周大权落入外戚杨坚手中。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了隋朝。

二、多民族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

1、各民族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虽然处于割据状态，但在长期的分化与整合之中，统一因素不断增长，推动隋唐时期再次形成全国统一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力图争得中华正统，以求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十六国时期，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时，声称：“帝王岂有常哉，大禹

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建立夏的赫连勃勃在为其都城命名时说：“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

统一我国北方地区的前秦苻坚也致力于统一全国，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在如何对待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时，他提出“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在发动淝水之战前，就发动战争的理由，他认为：“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我每当想到天下还没有统一，我就每每食物吃到一半我就吐出来了），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

宋人朱熹对此评论说：“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可谓一语中的！

历史上，人们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所以，后来很多学者来讨论，前秦讨伐东晋它有种种的“不应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前秦打东晋、前秦想统一全国，又是大势所趋。

经过秦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只要自身的实力足够，就一定要进行一场统一的战争，不管最终是胜利还是失败，都会进行这种尝试。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

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我国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为根本前提的。没有各民族的不断融合，就没有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形成和稳固，也不会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总人口多达千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所推行的汉化改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力排众议，于494年迁都洛阳，把百余万包括鲜卑人在内的北方各族人民迁到中原。他进一步推行汉化措施，规定朝廷议事禁止说鲜卑语，必须用汉语；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装；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鲜卑姓氏为汉姓。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交融，也增强了北魏实力。529年，南朝萧梁的陈庆之曾造访洛阳，返回南方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少数民族都强调自己是华夏子民，并且能够继承华夏正统，行使正当的统治。建立汉赵（前赵）的匈奴贵族刘渊自称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建立夏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也自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前燕是鲜卑族的慕容部建立的，其第一代君主慕容皝（huàng）之父慕容廆，史载“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号曰东胡”。建立前秦的氏族苻洪，“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建立后秦的姚萇之父姚弋仲，“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周书·文帝纪》在记载西魏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时也说，“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强调自己华夏后裔的身份，说明他们并不自外于中华民族，这对于国家的统一是非常有利的。

魏晋南北朝之际，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连续不断涌入黄河流域等汉族聚居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内迁的各族人民，大多成了国家的编户民，即使仍保持聚族而居，但与汉族人民往来频繁，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汉化；有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错居杂处，汉化程度更深；而中原大量的汉人也向西北、西南等地区迁徙。农耕与游牧等不同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在长期的冲突竞争中不断交流交融。原来的华夷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夷汉杂居”的局面。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

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使各个民族逐渐不分彼此，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来自两三个甚至更多民族的现象，在当时司空见惯。经过近400年的民族大融合，一些少数民族的名称消失，汉族因融合了诸多其他民族而强大；同时部分迁徙到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汉人，也融入

当地民族之中。经过长时间的杂居相处，各族人民之间增进了了解，民族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为国家重新走向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出土的陶俑来看，由东魏、北齐、北周到隋代，男女官服衣着还多承定都洛阳改定服制以后习惯，虽有变化，并不太多。反映出魏晋南北朝之际，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连续不断涌入黄河流域等汉族聚居区，其原有服饰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特别是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人改穿汉族服饰，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从坐具来看**，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在政治制度上，十六国与北朝基本上都是以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与汉族上层联合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重用汉族世家，采用汉族官制礼仪，如后赵石勒礼遇“衣冠华族”，“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前秦苻坚执政期间，重用汉人王猛辅政，“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北魏王朝同样借重汉族士人的知识与文化建立国家制度，如拓跋珪重视任用汉族士人制定典章制度，命邓渊定官制，董谧制礼仪，王德修律令，实现了由鲜卑军事贵族专政向中央集权的过渡。孝文帝为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排定姓氏等次后，汉族世家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在政治制度上也有了新变化，如在官制上，出现了“胡汉双轨”制度结合的现象。单于是秦汉时期匈奴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以单于为核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自刘渊建立前赵之后，十六国时期的许多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使用大单于制度。除匈奴人建立的汉、前赵政权外，还有鲜卑、羯、氐、汉等民族也使用了这一制度。随着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受汉族封建典章制度的影响日益加深。受汉文化影响，大单于制度融入了相当多的汉族官制，较秦汉时期匈奴的单于制度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胡汉不同政治制度融为一体，是促进国家重新走向统一的重要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少数民族内迁黄河流域，汉人也向南方、西北、西南迁徙，使我国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大为提高，加强了不同区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为国家重新走向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在内迁之前，已经不同程度受到汉人经济文化的影响。至魏晋之际，匈奴等游牧民族与汉人杂居，在汉人的影响下，逐渐转向农业生产和定居，打破了原有的部落组织，改变了较为落后的社会状态。其中，匈奴人的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太原地区的地主竞相招募，“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十六国与北朝都以农业为主，如后赵统治者、羯人石勒专门派遣大臣巡行各州郡，“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前燕，其统治者慕容皝“躬巡郡县，劝课农桑”；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均田制度，对北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并没有因为多个政权并存而被阻隔。东晋十六国时期，在前凉的姑臧（今甘肃武威）、前秦的长安、东晋的襄阳均设有“互市”机构，商人奔走其间，进行贸易，成为南北经济交流的常态。当时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拓展了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为隋代大运河的开通创造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观念的强化、政治的趋同、民族的融合、经济交流和联系的加强，使全国各地、各民族间逐步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同时，长期战乱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广大人民厌恶战乱，渴望统一。上述因素促使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再现成为必然。

第二节 中原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治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暂统一外，全国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多个政权并存、先后更迭，但中原各政权仍沿袭了汉朝的制度，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而新疆地区各地方政权都臣属于中原政权，这是这一时期政局的突出特点。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统治着北方广大地区，承袭汉制，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府。西晋代魏，依旧承袭曹魏在西域的军政管理体制。十六国到北朝时期，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以及后来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将郡县制和军镇制推广到新疆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一、郡县制的出现

221年，曹魏政权刚刚建立，就派敦煌长史张恭为戊己校尉管理西域。西晋政权建立后，继续设置戊己校尉。（为什么？经过秦汉长期的统一，在大一统观念下，中原政权始终视西域为故土。）与两汉时期稍有不同的是，曹魏、西晋时期的戊己校尉治所固定设在高昌，隶属当时的凉州刺史管辖；戊己校尉的权力更加集中，任职时间较长，且有世袭现象。

西域长史初设于东汉后期，是统辖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曹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复置。据记载，仓慈曾担任敦煌太守，仓慈死后，“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史治下发哀”。西晋时期，西域长史驻扎于楼兰，后人在楼兰古城遗址发现一封西域长史转发朝廷的诏书，“西域长史营写鸿胪书到，如书罗捕，言会十一月廿日。如诏书律令”，说明西晋的政令和法律仍行之于新疆地区。

301年，凉州刺史张轨建立前凉政权，至张轨之孙张骏执政时（324—346），前凉势力达到西域。前凉依然在海头城（今新疆罗布泊西）设立西域长史府。海头城遗址发现的一组书信残稿，是当时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前凉王张骏及西域城郭首领的信稿，反映了前凉仍设有西域长史一职。

327年，前凉在高昌设置高昌郡，下辖田地等县，这是中原的郡县制度第一次在新疆地区出现。前凉在高昌设郡后，明显加强了对高昌的统治，同时还在这里设有戊己校尉营，废除了以往戊己校尉军政合一的体制，代之以高昌郡与戊己校尉军政分离的管理体制。345年，张骏又派遣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同年，张骏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将原先仅有凉州一州的行政建置改变为凉、河、沙三州建置，其中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而张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从此，新疆地区成为前凉的管辖区域之一。高昌郡隶属于沙州，下辖有县，形成州、郡、县的三级行政管理体系。

4世纪中叶，氐人贵族苻氏以今陕西为中心建立了前秦政权，并取代了前凉在河西的统治。前秦王苻坚（357—385年在位）任命梁熙为持节、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经略西域。根据鄯善、车师前部的请求，前秦命吕光为持节都督率军西讨，鄯善王和车师前部王均“率其国兵为光向导”。384年，吕光率军击败龟兹后，西域各城郭纷纷归顺前秦，“讨平西域三十六国”，苻坚下令“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主持西域军政事务，对西域进行管理。同时，前秦亦在高昌设郡。早在376年，苻坚就任命杨幹为高昌太守。吐鲁番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说明前秦不仅在此建立了高昌郡，将郡下管辖的县扩展为高昌、田地、高宁县，县下设置了乡、里，而且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原的郡县制在新疆地区得到进一步完善。

386年，吕光建立后凉政权后，焉耆国王龙熙首先遣子入侍，表示服从后凉政权的管理。接着，西域诸政权也纷纷归顺。394年，吕光委任自己的儿子吕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可见，后凉继续设太守统治高昌，并派大臣子弟辅佐吕覆，对高昌的重视胜于前朝。

400年，敦煌太守李暠（hào）建立西凉政权，其势力很快进入西域。西凉继续在高昌

设郡，418年，李暠任其子李歆“为使持节、都督高昌、敦煌、晋昌、酒泉、西海、玉门、堪泉七郡诸军事、护羌校尉、征西大将军、酒泉公”，管理敦煌及西域事务。吐鲁番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八月廿九日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民韩渠妻随葬衣物疏》，证实西凉也在高昌地区建立了一套与中原地区相同的郡、县、乡、里行政组织系统。

401年，沮渠蒙逊建立了以凉州为中心的北凉政权。415年，沮渠蒙逊任命隗仁为高昌太守。吐鲁番出土的高昌郡文书，以北凉时期为最多，其郡县行政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完全与中原等地区郡县制度相一致。

北魏地方行政区划，基本承袭晋制，设州、郡、县。同时，为了边防的需要，北魏在西北鲜卑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还采用了军镇制度进行管理，即军区形式的行政区划。军镇中的镇将、戍主相当于太守、县令。445年，北魏出兵击败叛离的鄯善，派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并在鄯善设军镇，“赋役其民，比之郡县”，说明军镇征民赋役，军民兼治，具有郡县性质。448年，北魏打败焉耆王，又在焉耆设军镇，北魏孝文帝任命元桢为西域校尉，管理该地区的军政事务。鄯善镇、焉耆镇地位很高，军镇之下有戍，与县同级，如焉耆镇下即有柳驴戍。镇有都大将、都将、大将、长史、司马等职，戍有戍主、戍副、掾、队主等。与郡县相当的焉耆、鄯善两军镇的设立，进一步强化了北魏对西域的治理，标志着郡县制度由东向西进一步推进，为隋朝设立鄯善郡、且末郡打下了基础。

我国的郡县制度发端于先秦，确立于秦汉，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十六国时期，许多政权在高昌设立郡县，完善了行政与军事相结合的制度。郡县职官结构基本承袭了两汉与晋朝的制度，与内地郡县大同小异。郡、县、乡、里四级组织结构严密，中央政令可以迅捷下达最基层的乡里，反映出中原地区虽然处于割据状态，但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却依然非常严密。郡县制度的实行，开创了此后我国历代王朝治理新疆地区的新模式。

二、汉朝制度的承续

曹魏、西晋沿袭了汉代的治理模式，册封西域地方首领。据记载，车师后部王壹多杂被曹魏册封为“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说明曹魏政权仍沿袭汉朝给西域地方首领颁发印信的成例。283年，鄯善国派遣王子元英入侍，西晋“以英为骑都尉，佩假归义侯印，青紫绶各一具”。楼兰发现的西晋时代的木简内容“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寘王写下诏书到”，说明西域各地方首领被授晋朝官职，受西晋统辖。

从曹魏、西晋设立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到十六国诸政权设立的郡县制度，再到北魏设立的军镇制度，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行政管理制度日趋一致。经过长期的发展，高昌地区已是“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沙漠高山不再成为障碍，夷夏之隔的藩篱已被逐渐冲破，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短暂统一全国的西晋，还是割据分治的十六国政权，无论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都视西域为故土，将经略西域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前秦统治者苻坚在统一北方以后，“即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他说：“二汉力不能制匈奴，犹出师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虽劳师远役，可传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其欲继承两汉、开通西域，将教化播布于天山南北，从而流芳千载的志向非常明显。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基本统一北方后，即开始经略西域，他说：“自古帝王虽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其一统西域的豪迈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时期，“大一统”国家观不仅为汉族所推崇，也成为各少数民族政权倡导、奉行的理念和目标。

由于汉朝在西域已经奠定了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诸政权仍将中原政权视为汉朝的继承者而加以认同。222年，曹魏政权刚建立不久，鄯善、龟兹、于阗等立即遣使向曹魏朝贡，曹魏亦遣使回访西域。从此，“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

王弥宾入献前秦：“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并恳切请求“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383年，吕光率兵进军焉耆，焉耆王泥流与周围各政权望风归降，“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即各地首领纷纷将以前汉朝颁发给他们的符节上交吕光，表明自己一直是汉朝的臣子，而吕光则重新向他们颁发了前秦的印信。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诸政权为了表示对中央政权的忠诚，承续汉朝旧制，继续派遣王子入侍。三国时期，龟兹国遣子入侍，曹魏“褒赏其王甚厚”，从此，“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西晋时期，车师前部、鄯善、龟兹、焉耆等地方政权均将王子送往长安作为“侍子”。

自汉代以来，西域各城郭首领向中央派遣使者、进贡土特产品，这不仅是忠诚中央的象征，也是作为臣子的一份义务。魏晋南北朝以来，各地继续向中原王朝遣使进贡，而中原王朝也均予以厚赐回赏。前秦灭前凉后，“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liè）、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苻坚也派凉州刺史梁熙携大量丝绸赴西域宣抚。北魏派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当地数十个地方政权相继来朝。这些措施都加强了中原王朝的凝聚力，也增强了西域诸城郭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

第三节 民族融合趋势的增强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起蒙古高原，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至新疆地区，诸多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各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呈现出迁徙民族多、迁徙范围广、迁徙人口数量大、迁徙方向多等特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迁入黄河流域；北方草原地区的鲜卑、柔然、高车、嚙哒（yè dā）、突厥、吐谷浑（tǔ yù hún）大量进入西域；江南、岭南地区的山越以及南方广泛分布的蛮、僚、俚等民族，逐渐离开了原居地，被纳入南方各政权郡县之中，成为承担国家赋役的编户；而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分别迁入江南、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区。各民族杂居共处，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这一时期的新疆地区，在秦汉民族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民族，并与秦汉时期就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族交流互补、冲突融合，进一步开发了新疆地区。中原各政权的统一管辖，为新疆地区各民族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中，新疆地区各民族间密切接触和联系，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交融日益深化，使其差异性逐渐向共同性转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日益增强。

一、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入

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迁徙、大流动的背景下，许多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柔然、高车、嚙哒、突厥、吐谷浑等相继进入新疆地区，与此前就生活在这里的匈奴、乌孙、月氏、汉人等混居杂处，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当地各民族杂居共处，形成了各民族大融合的新局面。

鲜卑人是我国古代东胡人的后裔，早期生活在乌桓以北的大鲜卑山一带（今大兴安岭北段），并因此而得名。秦汉之际，鲜卑役属于匈奴。1世纪末，北匈奴在汉朝和周邻诸族的不断打击下，最终土崩瓦解，西迁他乡。鲜卑人从此占据北匈奴故地，据有漠北广大地区。鲜卑在南迁西进过程中，与匈奴、乌桓、汉人等融合形成许多新的分支。

柔然人是东胡人的后裔，主要是由鲜卑人和匈奴人融合而成，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蒙古高原兴起。柔然人最初由于力量弱小，一直臣服于拓跋鲜卑，后来势力壮大，最终统一了漠北，蒙古高原和周围诸族纷纷归附柔然。402年，柔然汗国建立。在与北魏的争夺中，柔然屡屡受挫，遂向西发展，后来控制了新疆地区的伊吾、高昌、车师、焉耆、龟兹、姑墨等地，成为主导西域形势的主要力量。

高车人最初生活在蒙古高原。5世纪初，柔然势力在大漠南北兴起，高车被迫向西迁徙，

进入西域，将柔然势力逐出，控制了高昌、焉耆、鄯善等地，形成了柔然衰微、高车强盛的局面。

嚧哒是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于漠北。大约在4世纪70年代初，嚧哒人越过阿尔泰山西迁至今中亚，进入阿姆河上游和中游，征服当地的粟特人，建立了嚧哒政权。五、六世纪之交，嚧哒人势力向东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占领了疏勒、于阗、龟兹等地，最终控制了高车政权。

吐谷浑是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其先祖游牧于今辽宁省一带。约在4世纪初，慕容部首领之子吐谷浑因与其弟不和及开拓新牧场的需要，率部从辽东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南、向西发展，逐渐控制了今甘南、四川西北部和青海等地的氐、羌诸族。吐谷浑最盛时所辖地域，西邻于阗，控制了今新疆东部的若羌、且末一带。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柔然、高车、嚧哒、突厥、吐谷浑等北方游牧民族相继进入新疆地区，与此前就生活在这里的匈奴、乌孙、月氏、汉人等混居杂处，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阚、张、马、麴汉人家族与高昌地方政权

高昌地区自西汉以来一直有汉人居住。前凉、后凉和北凉等政权在这里设高昌郡，派遣太守治理。北魏时期的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从460年至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居民的高昌国，历阚、张、马、麴诸氏。

首先建立的是阚氏高昌国地方政权（460—488）。460年，柔然攻占高昌后立阚伯周为高昌王，由此开启了高昌国地方政权的先河。张氏高昌国地方政权（488—496）的创建者张孟明，原为敦煌名门，后迁至高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表明，张氏高昌国仍然沿袭了北凉残余政权以来的行政区划，在高昌国都城所在地设置了高昌郡，并设有附属于郡的高昌县。马氏高昌国地方政权（497—501）是马儒创建的。马儒即位后，很快派人到北魏进贡表示臣服，请求举国内徙，但高昌民众眷恋旧土，不愿东迁，杀了马儒，而立麴嘉为王。麴氏高昌国地方政权（502—640）由金城榆中人（今甘肃榆中）麴嘉建立，直至唐贞观十四年（640）被唐朝灭亡，共存在近140年，是高昌国地方政权中存在时间最长的。麴氏高昌国时期，使用承平、义熙、甘露、章和、和平、建昌、延昌、延和、义和、重光、延寿等年号，向北魏、萧梁、西魏等进贡，与中原各政权保持密切联系。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四个汉人家族建立的高昌国地方政权，不仅王族是汉人，而且高昌民众中汉人也占有主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除了集中在高昌地区外，在新疆北部、南部也有分布。如于阗地区自汉代以来就有汉人居住，至此时当地人已经是“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反映出于阗地区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其居民的面貌特征已经与汉人很接近了。

三、各民族融合新气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全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新疆地区也形成了各民族迁徙交流融合的新局面，民族融合程度大大加深。

经过长期发展和兼并，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丝绸之路南道上形成了鄯善和于阗两个大的地方政权；在丝绸之路中道上则有焉耆、龟兹和疏勒三个大的地方政权；在新疆地区东部，相继出现了四个汉人家族建立的高昌地方政权。天山以北的民族主要有乌孙、悦般、坚昆、呼揭、匈奴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西域。鲜卑人进入西域并建立统治，与柔然人在西域争战；柔然人在天山南北扩张，一度控制阚氏高昌地方政权；高车脱离柔然，在西域建立高车地方政权，一度也控制了张氏高昌地方政权及塔里木盆地一带；嚧哒人虽然在西域统治时间不长，但也曾控制了高车政权；吐谷浑势力进入西域，控制了丝绸之路南道等。许多新的民族或部落进入新疆地区，极大地改变了秦汉时期新疆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从中原地区进入新疆地区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干线：一是河南路，经由陇右、河西，从敦煌西入新疆地区；二是草原

路，主要是经过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等活动区通往新疆地区；三是青海路（也称吐谷浑路），从陇右经青海柴达木盆地进入新疆地区。尤其是吐谷浑人统治时期，丝绸之路的南道为其所控制，在东西方经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上的密切交流，不仅使他们有了共同生产生活的地域，而且也增加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共同性，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融合。

大量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也是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各民族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的重要标志。两汉时期，新疆地区诸城郭之间、中原等地与新疆地区之间就有联姻、和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民族成分，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也明显增多。各民族之间的联姻，既有当地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也有当地民族与中原地区民族之间的通婚。

各民族之间的联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衣着服饰、社会心理等趋于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一体化意识的形成。

第四节 中原地区对新疆地区经济影响的加深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矛盾尖锐，大规模的战乱频发、多发，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政局稳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农业、手工业取得不断进步。我国经济重心开始从北方黄河流域南移，南北经济趋于平衡。由于民族融合加强，各民族之间密切联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随着中原等地区民族的大量迁入，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耕种技术和劳作经验也随之传入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长足发展。

一、多种经济在新疆地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生产方式，主要有游牧和农耕两种。柔然人、高车人和悦般人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畜养马、牛、羊。他们衣皮，食肉，饮乳，居毡房，随畜牧，逐水草而迁徙。“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胜兵万余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坚昆国在康居西北，胜兵三万人，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丁令国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随畜牧”。以上记载均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畜牧业发展的延续性。

农业在继承汉代开发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水利资源的管理得到强化和细化。这不仅体现在屯垦地区，更表现在地方政权对水利的直接管理和水利管理官员的设置上。吐鲁番地区高温少雨，气候极其干旱，水资源较为紧缺，因此高昌政权对水资源管理极为严格，诸城均设有水曹，水曹之下设有行水官和平水官。行水官的主要职责是分配民田灌溉用水，是在农田需水季节由诸曹在职官吏临时兼任，具有临时性、季节性。平水官是常设的官员，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水利建设和具体办理水利事务。吐鲁番地区原系汉朝的一个屯垦重地，魏晋时期依然是戊己校尉的驻地，十六国时期，这种军屯依然存在。

农具和耕作技术得到大幅度提高，当地已能够采矿炼铁，生产农具。新疆地区受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各地的耕作技术水平发展并不一致。直到北魏正光二年（521），且末一带人民耕作尚且“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但同一时期，屯垦地区和吐鲁番盆地的耕作技术比前代有很大提高。

“斫（zhuo）地”是在耕种前用耒（lei）耜（si）或者锸等挖土农具来砍地或刨地，这是深翻耕地的明证。塔里木盆地西缘的龟兹也广泛使用了锄头、犁铧等先进工具。克孜尔石窟第175号洞窟壁画上还有农民手持宽刃锄头劳动的场面，今天新疆地区的坎土曼即是由宽刃锄头改进而成。在同一洞窟的壁画中，还有类似二牛抬杠的牛耕图。同样，吐鲁番地区也大量使用先进农具。1964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中的一幅纸画，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的农庄情景。这幅图上有良田、庄稼、果木等，图的右上方是农田图，旁边还有

犁、叉子、齿耙等四件农具，与今天农村打谷时使用的叉子和筛子极为相似，反映了收获时的情形。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种植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的进步，也丰富了当地居民的饮食。长期以来，新疆地区粮食作物主要是麦、糜、粟、菽、青稞、高粱等，经济作物则主要是麻。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引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包括水稻等农作物品种。水稻原产于长江流域，新疆地区本无这种作物。稻种及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新疆地区后，逐渐得到推广和普及。当时除高昌盛产稻谷外，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地也都种植稻谷。焉耆“谷有稻粟菽麦”，于阗“宜稻、麦、蒲桃”，疏勒“土多稻、粟、麻、麦”。《洛阳伽蓝记》记述，朱驹波国（今新疆叶城）“五谷甚丰，食则面麦”，水稻为五谷之一，可见该地也盛产稻谷。

目前，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棉花籽实物出土于尉犁县营盘古墓群。墓中出土的文物上自汉朝下至魏晋，以魏晋时期居多，因此出土的棉籽极可能属于魏晋时期。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发现了身穿棉布裤的陶俑，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北朝墓葬中出土了棉织的褙褌布等，可见这一时期天山以南诸地棉花种植的普遍性。

石榴亦称安石榴，原为波斯及其邻近地区所产。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鄯善、且末等地盛产石榴，甚至成为当地的一种实物税。

复种制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是该时期新疆地区农业的另一亮点。复种是指一年内，在同一田块连续种植（收获）二季或二季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魏晋南北朝是吐鲁番农业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该地的作物种植制度也有新的突破，即“谷麦一岁再熟”。

这一时期的新疆地区商业十分发达，分“贡市”与“互市”两种。商人有行商和坐商之别，商人把西方的珍宝、香料、马匹，以及新疆地区的葡萄酒、葡萄干、玉器、棉布等运往中原地区，把中原地区的大量丝绸、铜镜等物产运回新疆地区，转销中亚，其中绢、马交易数量惊人。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综合《魏书》《梁书》《周书》《北史》诸史可知：高昌有城16座；于阗有大城5座，小城数十座；焉耆有大城9座；龟兹有大城1座疏勒有大城12座，小城数十座；此外还有鄯善1座，且末1座，总数多达80座以上。在上述地区中，高昌地区发展迅猛，城市的数量由原来的1座，迅速增加到16座，到了唐朝初年更是增加到22座。城市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农业、商业的发展进步。

二、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

各民族在长期的接触交往中，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魏晋十六国时，大量汉人迁往新疆地区，与当地诸族杂居共处，安家落户。从江南和中原等地区带来的优良农具和先进耕作技术，如修渠引水进行灌溉，改制耨犁以节省人力畜力等，带动当地的农业进一步发展。这一现象在以汉人较为集中的吐鲁番盆地尤为典型。进入麴氏高昌国时期，吐鲁番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田地出租、买卖盛行，并按照所种植作物的不同交纳实物税，经济繁盛，人口增加，显示出勃勃生机。

新疆地区原来桑树很少，没有养蚕缫丝、织绸织锦的技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中原地区种桑养蚕、缫丝织锦的技艺也开始广泛传入塔里木盆地。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资料证实，西凉时期高昌已有蚕桑业的出现。据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均有蚕桑种植。

从佉卢文书资料中也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的传播痕迹。民丰尼雅遗址曾出土了一份编号为565的佉卢文书，内容有：“星宿日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星宿日之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这与在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秦简《日书》记载的“宜于农业、畜产之日”相同，只不过尼雅人用“播种葡萄园”代替了中原地区播种其他农作物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已具有很强的互补、互利性，形成了有机整体。比如，龟兹除使用中原货币外，还有自铸货币——圆形方孔龟兹五铢钱，因

钱币的正面和背面或者有龟兹文，或者有汉文“五铢（朱）”，或同时有这两种文字，因此被称为汉龟二体钱，或汉龟二体五铢钱。这种钱币的形制和铸造工艺源于中原地区，反映了龟兹本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人民往来的频繁，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区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尤其是北魏迁都洛阳后，来自新疆地区的商人、艺人、僧人剧增，北魏政权还专门在洛阳设立“慕义里”，供商人经商。一件佉卢文文书记载：“现在没有商贾自汉地来，可不必清查丝债……待自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丝债”。尼雅出土文书记载：“入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綵四千三百廿六匹”。这说明，魏晋时期从中原地区向西输出的丝织品仍保持着巨大的数量。中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将中原的丝绸运至新疆地区，再经安息，运销罗马和希腊，将罗马和东罗马帝国的珍珠、玛瑙、水晶、琉璃和香料经新疆地区运至中原等地，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第五节 新疆地区多元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促进了不同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随着外来宗教佛教的传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在碰撞中交流，相互吸收，丰富了儒家文化的内涵。中原文化在吸收了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开放包容的新态势。许多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都模仿中原典章制度，改变自己旧有习俗，大力提倡儒学，研习儒家经典，遵循儒家的礼仪规范。在新疆地区儒家经典大量传入，儒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成为主导思想，儒家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交流互通，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图景。

一、多种文化的交汇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扩展，新疆地区同中原等地区的联系加强，中外使者、商贾东来西往，东西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经过当地人民的吸收与创造，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导、多种文化交融的局面。比较典型的是主要分布于天山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农耕文化。在东部的高昌、鄯善地区，中原文化长期居于主导地位。鄯善出土的丝织品基本由中原地区传入，在技法和艺术风格上完全是纯中原式的。在楼兰发现了带有“长乐明光”“延年益寿”字样的蔓草组合纹锦和带有“万世如意”“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字样织锦等实物。高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东西商贾往来其中，发达的商业文化深刻影响了高昌民间的某些习俗。

在天山南部，位居丝绸之路要冲的龟兹，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形成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结合当地文化传统的龟兹文化。而独具特色的佛教石窟艺术大放异彩，龟兹石窟在建筑、壁画风格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伴随着东西丝路贸易的发展和大批中原僧侣西行求法、巡礼，中原文化也影响到于阗等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于阗文化、龟兹文化与中原文化血脉相连，息息相通。

游牧文化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部地区。天山以北的草原上先后有嚙哒、悦般、高车、柔然等游牧民族活动，尽管如此，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柔然人最初“刻木记事，不识文书”，随着与中原交往的日益密切，他们也使用了汉字。466年，柔然可汗予成仿汉制，立永康年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各种文化在新疆地区汇聚、交融的突出表现就是对犍陀罗艺术的吸收。古代犍陀罗人将古希腊、罗马艺术与印度佛教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中亚文明史上绚丽多彩的犍陀罗艺术风格。随着佛教从印度、中亚地区传入，犍陀罗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龟兹。而龟兹石窟建筑中的穹庐顶和拱券顶窟形及壁画中，用平行双线表现人物衣服折痕的手

法，则是受古代波斯文化影响的结果。各族人民对不同文化加以改造和吸收，使之成为新疆地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二、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各政权对新疆地区管辖力度的加强，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大量汉人进入新疆地区，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

儒家文化思想在新疆地区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当时，汉语在高昌国占据主导地位，在王国内流行五经、诸子集、历代史等汉文典籍。如在鄯善出土了《三国志》的《虞翻传》和《张温传》残卷，在吐鲁番出土了大量高昌国时期用来教学的经史典籍《毛诗》《论语》《孝经》《孝经解》《汉书》《三国志》《晋阳秋》《谥法》《急就章注》《千字文》等写本残卷，反映了新疆地区各民族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的情况。通过学习中原文化，“大一统”思想在新疆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为普及儒家文化，麴氏高昌国开设了官学——太学，太学中有博士、祭酒、司成等官员，学生多是贵族子弟，学的是儒家经典，并按“学而优则仕”的原则，选拔成绩优良的学生充当官吏。麴氏王室宫廷“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6世纪初，高昌王麴嘉向北魏遣使请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由此可见高昌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和对官学教育的重视。

在高昌地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广泛传播。“有人直接以《孝经》随葬，在哈拉和卓91号墓中还发现有西凉建初四年（408）的《秀才对策文》，反映了儒家思想在高昌地区影响广泛。

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县制在新疆地区确立，其职官结构基本承袭了两汉与晋朝的制度，与中原等地区郡县大同小异。官文书制度既反映君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反映官僚制度组织的相互关系。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地方政权时期的官文书来看，既有高昌王给各机构下达政令的下行文书，也有各行政机构上奏高昌王的上行文书，表明高昌政权存在着一套来自中原的完整的官文书制度。

汉语的使用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新疆地区民族众多，语言各异，其中主要有佉卢文、于阗文、焉耆一龟兹文，“唯国胡语不同”，妨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西域官方及民间文书基本都使用汉文书写，说明了汉语言文字成为各民族共同选择的沟通工具。尼雅遗址所出土的汉文简牍、楼兰遗址中发现的《战国策·楚策》抄本、鄯善地区发现的晋人《三国志》抄本，都是当地居民学习和使用汉文典籍的明证。除高昌、罗布泊外，其他地区也广泛使用汉文。在楼兰遗址，考古发现的数量可观的汉文木简和纸文书，均属于252—330年之间。罗布泊海头城遗址发现的李柏文书系用汉文所写。李柏在信中向前凉王察报西域情况，并且急速修书与已经降凉的焉耆王沟通联系，说明焉耆统治阶层中也通用汉文。汉龟二体钱币上的铭文有汉文和龟兹文两种文字，说明了汉文在龟兹地区的流行。

这一时期，汉语作为西域的通用语言广为流传，当地人在使用通用语言时也“兼用胡书”，说明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彼此认同，形成强大的黏合力，共同推动了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汉语言的广为流传为中原地区的医学技术传入新疆地区提供了条件。据文献记载，新疆地区本地的医生被称为“胡医”，当地居民也可以使用草药止血。汉朝统一西域后，中原地区的医术开始在新疆地区流行。如西汉时期，汉朝就曾派人持医药为乌孙王疗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医学对新疆地区的影响日益加强。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原医学已经对新疆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中原地区文化与新疆地区文化的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互动，促进了文化的交融，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当时新疆地区流行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

高昌乐等对中原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六国时期，前秦大将吕光率兵远征龟兹，吕光东归后，龟兹乐跟随而入，传至河西，历西凉、北凉，传承不辍。北魏统一中原后，龟兹乐风靡中原，对中原乐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周武帝时，龟兹音乐大师苏祇（zhī）婆于568年来到长安，最早将龟兹音乐“五旦七调”的理论传授给中原音乐家。“五旦七调”理论的确立和运用，丰富了中原乐律。

河南安阳出土的北齐黄釉瓷扁壶上，绘有一幅胡舞图。图中一胡服男子舞者奔跑腾跃，右手弯过头顶，左手舞于腰背，六个乐人或演奏琵琶、横笛等乐器，或击掌弹指为舞者伴唱，这种汉胡共舞、乐器混编的情景，生动地体现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乐舞的传播、交流与融合。

在佛教石窟绘画方面，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吸纳了东西方绘画艺术技巧，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建筑绘画艺术。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壁画中人物轮廓用较粗的线条，线内用笔略加烘染，这样的人物形象不仅造型分明、立体感强烈，且给人以质感，显得丰满；龟兹石窟壁画线条紧劲连绵、明快流动，墨色和水分运用活泼酣畅，形象富于传神和动势，显现出中原绘画艺术传统特征和气质。

佛教的东传，佛经的大量翻译，给我国文化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佛家本生和经变故事的影响下，中国的神话志怪小说也日渐丰富，不但开创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先风，而且对明清白话小说也有深远的影响。伴随着佛教的盛行，石窟佛像的雕塑对我国雕刻艺术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也更加广泛地传播到新疆地区。比如，包括了舞蹈、奏乐、杂技、说唱等多种表演形式的百戏，在新疆地区也十分流行。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礼仪风俗的影响同样也是双向互动的。中原地区在接受新疆地区礼仪风俗的同时，亦对新疆地区礼仪风俗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罗布泊早期墓葬出土的服饰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汉代以后，随着交往不断加深，丝织品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服饰也传入新疆地区，鄯善、于阗、龟兹、莎车等地居民积极效仿汉人服饰。这时自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俗人被服粗类秦土，亦以毡褐为异”，说明普通居民的羊毛服装式样也和中原无别了。高昌男子的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说明高昌人男女服饰既有本地服饰的特点，又有对中原服饰的吸收与融合。

新疆地区食物、炊具东传的同时，中原地区的食物、炊具也随着大量汉人来到新疆地区而传入。尼雅遗址中发现的木筷、罗布泊遗址和吐鲁番晋墓中发现的陶制釜和甑（zèng）、古代切割和陈列肉食的木俎等，均系中原地区传入。

由于民族融合，新疆地区婚姻礼俗逐渐接近中原地区。焉耆“婚姻同华夏”，高昌“姻有六礼”，龟兹、于阗等地婚俗又与高昌、焉耆“略同”。在库车县友谊路考古发现的西晋至十六国时期墓葬中，墓葬形制、埋葬方法、随葬器物等方面与甘肃河西地区的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相近，说明新疆地区葬俗文化愈来愈多地表现出与中原地区的一致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多民族的分布格局，不同类型文化的传播，使这一时期新疆地区文化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过三四百年的整合，尤其是中原文化广泛深入的传播，新疆地区文化进一步汇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六节 佛教兴盛与多种宗教的并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地区流行的主要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开始出现了本土化的趋势，佛教徒在翻译佛经和传播教义时，常常援引、借用道家 and 儒家的名词术语，以便于理解和沟通。还有不少佛教徒乃是由儒、道入佛者，原本精通儒学，旁通老庄，后来接触佛教，遂出家为僧。随着三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吸收，儒释道汇通成为主

流趋势。此时新疆地区的佛教发展已进入鼎盛阶段，与原有的祆教、萨满教及新传入的道教和谐共存，各种宗教相互借鉴交融。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佛教之间的交流频繁，佛教中国化趋势日渐凸显。道教传入新疆地区，带来了新的因素，新疆地区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格局进一步发展。由于儒家文化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传播，新疆地区也与中原地区一样，出现了儒释道汇通合流的趋势。

一、佛教、祆教、道教等宗教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佛寺林立、僧侣众多，大量僧侣来往于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之间，在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地形成了佛教中心。晋代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在途经于阗时看到，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各类寺院，“众僧乃数万人……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在龟兹，佛教寺院众多，仅龟兹城内“有佛塔庙千所”，最大的寺院即昭怙厘大寺，享有龟兹国寺的地位。这时期还开凿了成群的佛窟，现存石窟有 17 处之多。这些石窟中的佛像雕塑技艺高超，并影响到中原地区，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艺术瑰宝。

祆教盛行也成为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宗教传播的特点。高昌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祆教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专门设置了“萨簿”一职。5 世纪后祆教在塔里木盆地广泛传播，并在此后传播到我国东部地区。

5 世纪初，道教在高昌地区已经较为流行。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家族建立的高昌地方政权，聚居了大量汉人，他们把儒家思想、汉传佛教、道教信仰带到了新疆地区。1998 年，考古工作者在楼兰发现一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老年男性遗体，其棺木两端分别画有朱雀和玄武图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被称为四象，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灵。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五行学说盛行，所以四象也被配色成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两汉时期，四象演化成为道教所信奉的神灵，因此四象也随即被称为四灵，成为汉代画像石中最为常见的形象，范围遍及全国。楼兰彩棺上出现的四象图案，不仅说明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的深刻影响，也说明了道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

二、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

佛教在当时的新疆地区十分兴盛，与萨满教、祆教、道教等和谐并存、并行传播，这是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共存的明显特征。

作为最早传入新疆地区的外来宗教祆教，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宗教始终处于和谐共存的状态。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焉耆“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说明这些地区都同时崇奉祆教天神和佛教佛陀，二者并行不悖。同时，新疆地区佛教也吸收和借鉴了祆教的某些元素，如龟兹佛教将“佛陀”与“天神”相结合，称为“佛天”或者“佛神”。

这一时期，新疆地区佛教与中原佛教交流频繁。佛教最初传入新疆地区时，其佛与菩萨的形象还有深目高鼻的“胡貌”，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形象已经转变为中原地区人们的外貌特征。同时，新疆地区的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十分兴盛，进入中原传教的西域僧人络绎不绝。据《高僧传》记载，当时有姓名可考的西域僧人就有 54 人，最为著名的有鸠摩罗什、佛图澄等。而中原的僧侣们也毅然西行求取经典，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朱士行、宋云、法显等。他们通过西行，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促进了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佛教的交流发展。

在新疆地区，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也与佛教相互融合。吐鲁番出土的《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随葬衣物疏》中记载：“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孝姿，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急急如律令。”其中，五道大神“是道教中的大神，而且是主管‘冥关幽路’的神”，“急急如律令”又是非常典型的道教用语。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佛教弟子运用道教的法术咒语或者道教弟子同时信奉佛教教义，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佛道杂糅、相互融合的现象。

学习思考：

1.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各政权是如何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的？
2.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又增加了哪些新的民族成分？
3. 谈一谈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多学汉言”现象的认识。